



ENCYCLOPAEDIA OF THE
PEOPLES OF CHINA

中华民族

张海洋 保罗·理查森 主编



译林出版社

ENCYCLOPAEDIA OF THE
PEOPLES OF CHINA

中华民族

张海洋 保罗·理查森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 / 张海洋等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447-5192-6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华民族-通俗读物
IV. ①K2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8603号

书 名 中华民族
作 者 张海洋 等
项目策划 刘 锋
责任编辑 谢山青 王玉强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4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192-6
定 价 14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前言	2	25. 珞巴族	132
第一部分		26. 羌族	135
1. 汉族	22	27. 普米族	139
第二部分 东北及内蒙古地区		28. 彝族	142
2. 朝鲜族	34	29. 白族	146
3. 满族	38	30. 纳西族	152
4. 锡伯族	44	31. 傈僳族	156
5. 赫哲族	48	32. 怒族	159
6. 鄂伦春族	51	33. 景颇族	162
7. 鄂温克族	55	34. 拉祜族	165
8. 达斡尔族	58	35. 哈尼族	169
9. 蒙古族	62	36. 基诺族	174
第三部分 西北地区		37. 阿昌族	177
10. 回族	70	38. 独龙族	180
11. 东乡族	76	39. 佤族	184
12. 保安族	80	40. 布朗族	189
13. 撒拉族	84	41. 德昂族	192
14. 土族	87	42. 傣族	195
15. 裕固族	91	43. 壮族	200
16. 维吾尔	94	44. 仫佬族	206
17. 哈萨克族	100	45. 毛南族	209
18. 柯尔克孜族	105	46. 布依族	212
19. 乌孜别克	108	47. 水族	218
20. 塔塔尔族	112	48. 侗族	223
21. 俄罗斯族	115	49. 仡佬族	228
22. 塔吉克族	118	50. 土家族	232
第四部分 西南及东南地区		51. 苗族	237
23. 藏族	124	52. 瑶族	242
24. 门巴族	129	53. 畲族	246
		54. 京族	250
		55. 黎族	253
		56. 高山族	257
		参考文献	263

目 录

前言	2	25. 珞巴族	132
第一部分		26. 羌族	135
1. 汉族	22	27. 普米族	139
第二部分 东北及内蒙古地区		28. 彝族	142
2. 朝鲜族	34	29. 白族	146
3. 满族	38	30. 纳西族	152
4. 锡伯族	44	31. 傈僳族	156
5. 赫哲族	48	32. 怒族	159
6. 鄂伦春族	51	33. 景颇族	162
7. 鄂温克族	55	34. 拉祜族	165
8. 达斡尔族	58	35. 哈尼族	169
9. 蒙古族	62	36. 基诺族	174
第三部分 西北地区		37. 阿昌族	177
10. 回族	70	38. 独龙族	180
11. 东乡族	76	39. 佤族	184
12. 保安族	80	40. 布朗族	189
13. 撒拉族	84	41. 德昂族	192
14. 土族	87	42. 傣族	195
15. 裕固族	91	43. 壮族	200
16. 维吾尔	94	44. 仫佬族	206
17. 哈萨克族	100	45. 毛南族	209
18. 柯尔克孜族	105	46. 布依族	212
19. 乌孜别克	108	47. 水族	218
20. 塔塔尔族	112	48. 侗族	223
21. 俄罗斯族	115	49. 仡佬族	228
22. 塔吉克族	118	50. 土家族	232
第四部分 西南及东南地区		51. 苗族	237
23. 藏族	124	52. 瑶族	242
24. 门巴族	129	53. 畲族	246
		54. 京族	250
		55. 黎族	253
		56. 高山族	257
		参考文献	263

前言

中华民族研究与中国文明建设

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当今中国经济体量全球第二,城镇人口超过全国人口半数。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 60 多年的新中国正在超越几千年以农立国的自给自足状态而加入现代世界体系。今日中国对全球能源和市场的需求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因而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需要把握国情、理解自身,同时也更需要融入世界并向世人说明自身的特点、需求、能力和潜力。那什么才是代表中国把握国情、理解自身、融入世界并向世人说明自身特点、需求、能力和潜力的主体?答案就是中华民族。

中国国歌诉求的主体是“中华民族”。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跟人打交道的主体身份也是中华民族。理解这个中华民族主体就是中国人文化自觉的体现。阐释这个中国、这个主体就是中国学界,特别是民族学界责无旁贷的使命。

中华民族研究因此就不仅是学术课题,也是为中国人民在世界上谋求安身立命支撑点的重要事业,因而也是经世致用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国很早就是东亚文明体系的中心。这个文明体系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张光直和杜维明两位先生概括这个结构的特点是:在整体性的宇宙观下形成的有机、连续和动态性的社会文化体制。中国历史上的陆上对外通道以西北和西南两条丝绸之路为主。生计方面,中国文化始终建基于东南定居集约农耕与西北粗放农牧兼营两大板块,如同太极图上的两仪。两仪之间的文化边界约等于东西走向的长城和南北走向的红

军长征路线。这两大生计板块的互动在上古时期呈现为东西,中古以来又呈现为南北。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挑战,开始了现代国家的民族关系构建:先由清代的“满汉”进至民国的“五族共和”,再经过 1950 年代的民族识别而进至当前的 56 个民族。今日中国汉族占全国总人口 91.51%,少数民族占 8.49%。但中国 64% 的国土是少数民族自治的地方。少数民族的人口也多达 1.13 亿(2011)。如果接受一个民族拥有一种文化的说法,那么少数民族拥有文化资源就占到中国文化总量的 98%。中国的 56 个民族讲 5 个语系的 70 多种语言,这些语言多半属于汉藏和阿尔泰两大语系。中国有 56 个民族,使用近 30 种文字。其中的象形表意文字均产生于本土,拼音文字多随着文化交流而从中亚、南亚和西方传入。中国现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均与少数民族关联密切。这些宗教多为两千年来在本土生成或从国外引进。在这些宗教之下,还潜存着更加宏大深沉的民间信仰母体。这个信仰母体在各民族中有不同称谓,但都跟萨满教一样关乎敬天法祖、尊师重道、孝亲爱国和仁民爱物。在世界上相互冲突的各种宗教一旦进入中国语境,就会向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中国多样的自然生态、生计方式和文化传统能为各种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提供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费孝通先生当年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解释是:多元指中国有 56 个民族;一体指 56 个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由于中国距离其他文明中心较远,所

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于“自在”阶段,没有很强的整体意识。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过西方列强不断侵袭挑战,特别是经过抵抗日本侵华的全面抗战,中华民族终于形成了“自觉”的整体意识,多元一体结构于是生成。

本书采用“大小传统互动互化”的模式对费先生的模型做出补充:这里的“多元”是指中国历来拥有众多的民族、民俗、民间和地方的文化小传统。这里的“一体”是指中国在这些小传统之下又共同发展出一个历史文化大传统。起源上,国家的历史文化大传统次生于民族民间和地方的文化小传统。实践中,大小传统通过相互渗透、相互滋养而生生不息。结构上,国家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居于中国文化体系的高位,而民族民间和地方的文化小传统则有着更多的层次和活力。1949年新中国通过建国《共同纲领》确立起各民族政治平等、经济互助和文化共同繁荣的原则,这种大小传统多元一体的格局才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稳定下来。目前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都在为中国和谐社会构建和中华民族复兴发挥着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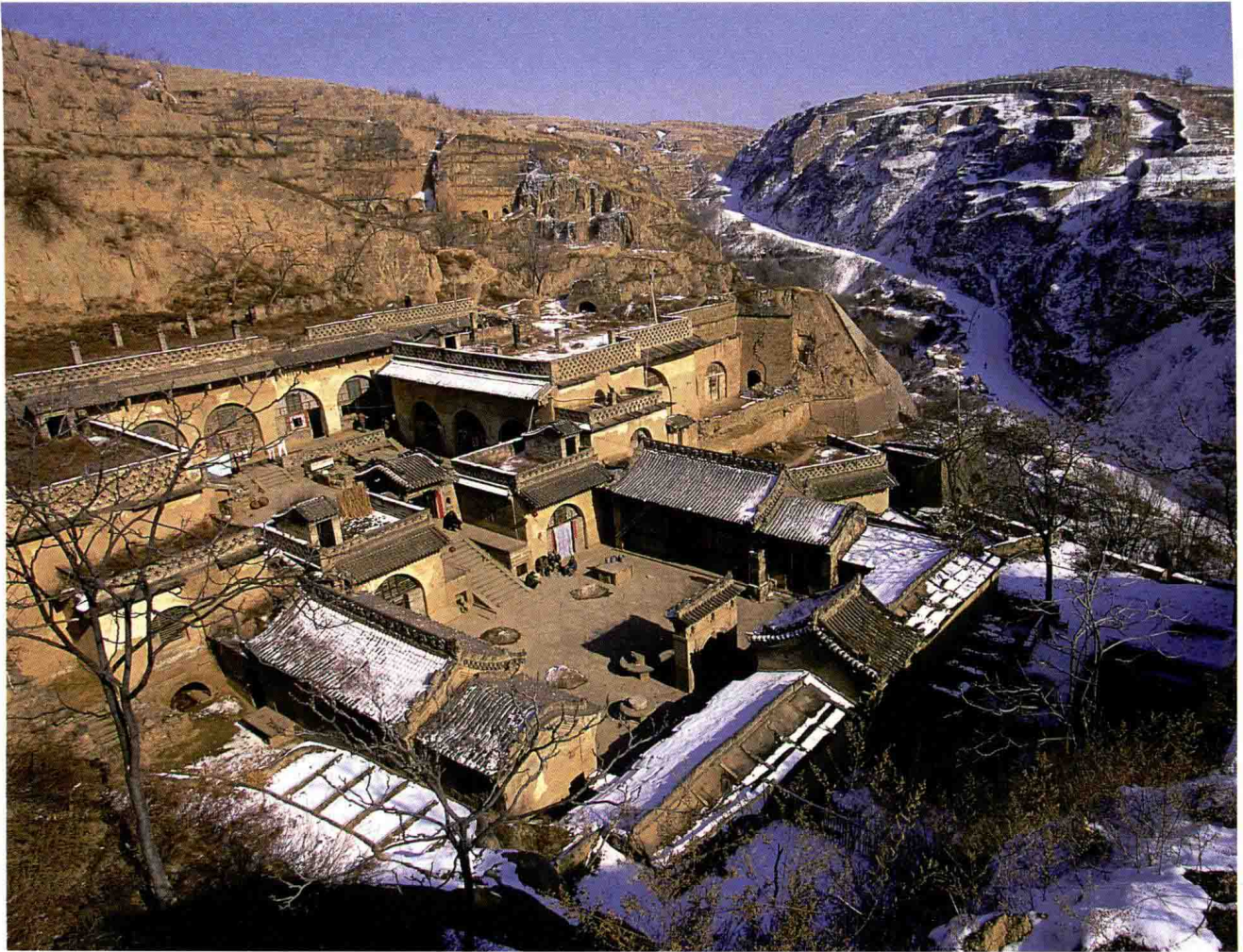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大传统的阐释则不够充分,从而导致误解丛生。学界的认知误区之一是把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的创制都归于“汉族”。这种混淆华汉的做法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贡献承认不足,因而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公平。我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的内容做出如下概括:西高东低的地理基础、耕牧并重的生计类型、家国同构的宗法组织、重文轻武和尊师重教的价值观念、一国N制的治国理念、敬天法祖的社会礼教、表意文字承载的儒家学说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这些内容深潜于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经历之中,它只能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参与创造而不可能由汉族一手包办而成。

上古中国早有氏族、部落、语言、宗教等认同单位。

四千年前,中国的东南部农耕与西北部畜牧两大生计板块在黄河中下游强烈互动,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由多民族精英组成的统治阶层和一个兼容多民族文化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断从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小传统中取精用宏,最终发展成适合治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大传统。由于大传统得到历代各民族中央权势的支撑,所以它不曾中断且能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地同化和吸收周边各民族各地方的成员,并从他们当中吸收精英人才进入统治层。今日中国的汉族就是在这场互动中失去自身小传统而较深地同化于大传统的民族;而今天的少数民族则是由于地理和社会(如宗教)等原因而较多地保持了自身文化小传统的民族。但少数民族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不等于他们对国家的历史文化大传统没有贡献或没有认同。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正是通过各民族、族群、祖籍、出生地或方言区认同的中介才得以升华和实现。王赓武先生对海外华人文化中心的研究对于这层道理曾有深刻的揭示。何兹全教授指出:傅斯年先生能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提出振聋发聩的“夷夏东西说”,也与他生长于上古东夷人发祥地山东聊城大有关系(何,2000)。汉人较早和较深地同化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的大传统,也不等于就有了垄断这个大传统而排斥其他民族历史贡献的资格和权利。

按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论原理,今日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结构是 $56 + 1 = 57$ 个模型。这里的1是指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56是指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在这个结构里,中国各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都各有安身立命的空间。国家可以在这个前提下保护、尊重和弘扬各民族文化,推动文化产业及和谐社会建设。各民族人民在相互交往和对外交流中保持平和和自信的心态。

张光直教授通过比较中国上古三代、美洲玛雅和西亚的苏美尔文明资料,对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做出过如下阐释:西方文明基于工具技术和商贸制度创新,在本质上属于突破跳跃型且具有排他性。相比



上：陕西米脂县民居 (TPG Images) / 下：江西省景德镇陶瓷作坊 (TPG Images)

之下,借助于对劳动力的组织动员和控制管理实现高度发展的中国文明则有着更强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它能把不同时代和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兼容在一个总体结构之内来维持和谐发展。从全球文化角度来看,西方的突破和跳跃型文明才是特例,而属于“古代亚美基层”的中国、印度、中美洲的连续和兼容型文化,即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那种东方文化,才有更大的普世性(张光直,1990)。放眼观察今日中国民族文化结构,我们更能体会和认同张光直先生的远见卓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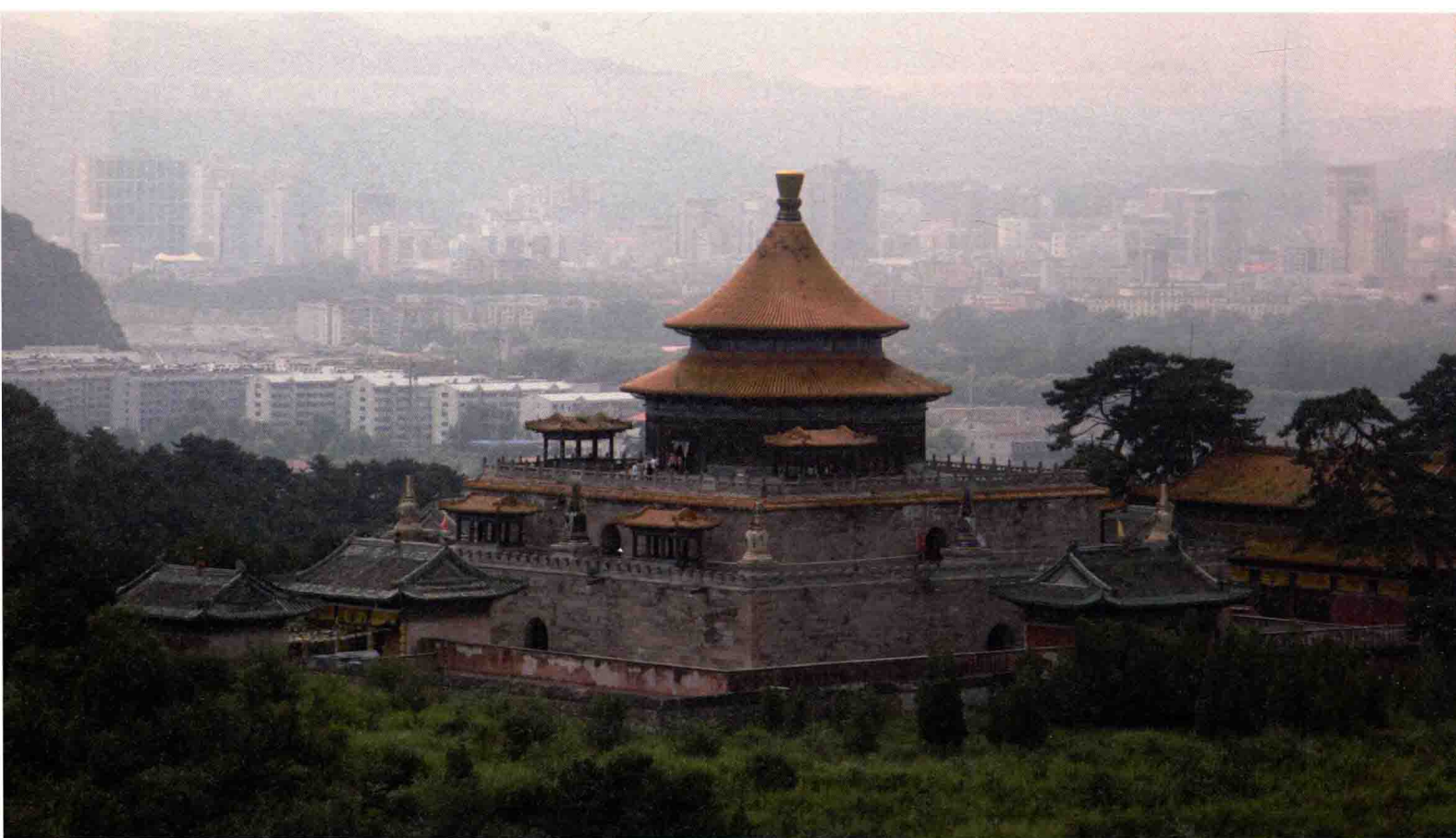
中国的疆域辽阔、历史悠久、生态环境复杂、文化类型多样、距离西方遥远、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日尚浅,因而能在近现代剧烈而且频繁的内忧外患之中较多地保持了多元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曾使中国的汉、唐、元、清等朝代强盛,曾使中国采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较好地应对多元文化共存问题,曾使中国的生态环境免于在“大跃进”中毁于一旦,曾使很多中国人在三年饥荒中因为流动到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而免于沦为饿殍,曾使中国计划经济不像前苏联那样积重难返,曾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找到东南沿海窗口,曾赋予中国领导人以“一国两制”方式收回港澳主权的智慧,也将为台湾海峡两岸统一提供前景。但由于近代中国制度转型一度滞后,招致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多次凌辱,所以多元文化的这些正面价值都被压抑掩盖,甚至被当成经济负担和社会禁忌。今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进程而有所振作,我们也应着手从全球文化史的高度来评价本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功能。

现代中国也曾激进。激进的中国也曾削足适履,试图通过剪除或改造传统的多元民族文化来实现富强。这种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和文化亏空。例如,今日中国人文道德资源的流失就跟水土流失一样严重。中国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就要从承认和恢复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在当地的主体性入手。中国的少数民族之所以是“少数”,

正因为他们所在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换言之,中国能成就并保持其大,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有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参与和贡献。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的经济“帮助”从来不是一种单边的“优惠”,而是一种互惠义务。在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兼容多元民族文化并承认其主体地位,不仅是国家的价值选择,而且也是由国情决定的结构需求。

当今中国面临人口塌陷和老化、劳工刘易斯拐点、社会中等收入陷阱、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增长失速、民族关系退化、社会矛盾激化等矛盾和问题,因而必须尽快创新转型。党和国家为此不断发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和包容性发展等信号。但由于各地许多官员仍然对GDP增长上瘾,这些转型信号一再失灵,所以才使国家要推动改革,与危机赛跑。由于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创新的本质都是向着国情和人性回归,所以我们要依照建国《共同纲领》来重新认识国情和历史。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文明由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的疆域和权益由各民族共同维护。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但仍承认“五族共和”。新中国建国《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都肯定少数民族作为国家平等公民和能动主体的政治地位。中国还为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力而开展了民族识别并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汉人、汉文化跟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整齐对应的局面。我们因而要推动“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式转换,要推动国家开展华汉之辨,要运用中外文化比较来呈现中华民族整体特点并充分阐释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创中华的事实。我们希望这能提升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增强其文化信心和政治向心力,同时为国际交流提供健康的外宣话语。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中国学界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区域的认知和研究范式从“社会发展史”转换成“文化生态学”。

社会发展史又称古典进化论或单线进化论。这是西方启蒙运动期间兴起的社会发展观。它主张人类



上：秦始皇陵兵马俑 (TPG Images) / 下：承德避暑山庄 (FOTOE)

普遍具有理性,而理性能保障人类社会持续进步和不断趋向完美。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学成果,将此发展成历史唯物论。20世纪中叶,斯大林和联共(布)又把内涵丰富的历史唯物论简化成仅仅包含五种形态的社会发展史:即人类从原始社会出发,经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阶段,最终进入无阶级、无民族、无宗教,亦无政党和国家的大同社会。这是西方哲人在现代化早期对于其自身突破型文化的概括和想象,其中也含有欧洲中心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分。

文化生态学又称多元进化论,它也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种研究范式(任国英,2004)。文化生态学主张从文化与环境相互适应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别。在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时代命题下,文化生态学可以成为中国对于本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一种新的认知范式。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进化论,但它避开了“历时排列共时多元文化”的认知陷阱,增加了文化相对论的辩证观点。文化相对论主张衡量每种文化的标准不在该文化之外。至少在精神领域,我们不能用某一个民族的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举例讲,如果用生产工具做标准,西藏原先的社会形态确实相当原始。但如果用哲学和宗教做标准,西藏的发展阶段就不比任何民族地区低。

抽象地看,社会发展史和文化生态学各有所长。前者讲的是基本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后者讲的是较高层次的和谐及可持续之道。但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目标看,我们从社会发展史中就只能推导出文化落后论和消亡说;而从文化生态学中,我们却能推论出各民族文化价值平等和共同繁荣说。在这个理念下,中国学界的任务就将是“两个保护、一个维护和一个阐释”: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国内各民族的文化、维护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权益、阐释中国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同繁荣的历史文化道理。

目前中外学界对中华民族的认知话语仍然停留在

历史文化领域,缺少对于中国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政治顶层设计和终极人文关怀,因而无法对主流偏见形成正面的冲击和挑战,无法支撑国家重大创新转型决策。我们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的顶层设计和对中国各民族的终极关怀扭转这种形势,做出创新格局。

当前中国出版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作品虽多,但展示的主要是其传统风俗艺术和工艺。对于作为文化核心的少数民族科技知识、生态伦理、社会道德、价值观和精神文明成就挖掘不深、展示不足,因而需要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方面做出平衡安排。本书针对上述缺陷,采用创新范式:首先把看待少数民族文化的视角从社会发展史、单线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转换成文化生态学、社会公平、互惠博弈和各民族文化公平传承传播,然后在作品内容中平衡呈现各民族文化习俗的生态环保、道德规范、文化传承和精神文明等内涵,体现各民族传统与现代社会价值并行不悖、中华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承认今日中国跟历史上的中国一样,永远需要有“现代”与“传统”、“同化”与“认同”这两种精神价值作为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来相互为用。但这种承认要基于两个前提:一是两者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对中国各民族的发展整体有利,而不能仅对一些人有利而让另外一些人去付出代价;二是两者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相互兼容并存不悖,而不能试图用一种价值去替代另一种价值。

本书为体现“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范式转型,尝试采用“华汉之辨”的方式来更新文化历史观,消除中原中心论和大汉族主义成见,推动中国的民族文化研究从以汉人为中心的托勒密体系转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哥白尼体系。我们按照“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系统论原理,认为中华民族高于汉族。汉族跟各个少数民族应该平等相待,应该把近百年侵夺的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资源清退出来,让中国各民族认同共享,使民族关系再次走向共和,在中华各民族“共同



上：蒙古族传统服饰 (Getty Images)

下：鄂温克族在每年6月份都要祭拜敖包、祖先神“敖教勒”（“根子”之意）、牛羊马形等神偶、熊神等，图为通古斯鄂温克族祭拜敖包（卡丽娜 摄）



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旗帜下构建和谐社会。本文采用文化生态学理念整理的中国历史文化结构和进程的内容梗概如下:

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数概念,而是一个兼有东洋东亚、南洋南岛、内亚南亚多种自然生态,多种文明传统,数十个民族和上百种语言文化与宗教文明的天下共和体系。近代以来,这个体系跟现代世界体系强烈互动,加上往圣先贤、开国元勋和各民族精英的恢宏创意,才做出了全球最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今日中国东南有港、澳、台,西北有蒙、新、藏;内有少数民族,外有海外华人;前有亿兆先民,后有无尽子孙;上有祖先神明,下有六道众生。大家要在中国这个生态家园里安身立命,首先就要看少数民族及其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安全处境和前景。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不及全国 10%,民族自治地方却占到全国的 64%。但少数民族对国家影响不止于这些比例数字,而在于它对国家体制、生态环保、国民认同、文化发展、人伦底线和国家形象的重大意义、巨大贡献和无限潜力。举例讲,中国的陆疆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等 14 个国家接壤。中国的 40 000 公里边境线(包括 22 000 公里陆疆线和 18 000 公里海疆线)都落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或少数民族世居地。支撑中国海疆权益的台湾和海南两岛,更是少数民族原住民的生态家园。中国如果泯灭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宗教多样性,就会破坏边疆文化生态,不仅无力对外输出文化影响,还要从外面引进语言教师、宗教头人,甚至会断送那些仍然有待收回的边疆领土权益。如果当前中国要推动民族文化繁荣,那包括语言宗教在内的各民族文化资源跟“汉人”相比就有 55 : 1 的关系。

中国的民族文化结构植根于新石器时代。当时中国大地以萨满教为底色,形成三个生计板块:一是东部山林海岛及沿海渔猎采集兼粗放农耕的山海板块。它

的组织形态是相对平等的亲族群体,且有“不被治理的艺术”即 ZOMIA 文化。二是集约农耕的中原板块。它有较发达的阶级分层和集权萌芽。三是畜牧兼粗放农耕和商贸的西北板块。它用宗教来维系氏族部落联盟,能按需求实现拆合而不失凝聚力。

四千年前,西北畜牧板块从西北欧亚草原方向引进车马骑术和青铜兵器而与中原板块沿着黄河中下游锋线互动,从而把史前史推进到英雄辈出的古史传说时代,形成了中国文明农牧复合的胚胎。这个复合文明胚胎凭借政治军事优势向东向南扩展,把东部沿海板块撕裂成东北山林、东南沿海及岛屿和西南山林三个小板块。此后,这个文明内部的农牧两大板块又沿东西向的轴线互动,成就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完善了象形表意文字,奠定了兼有农牧基因的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根基。

三千年前,西部毗邻牧区的“小邦周”克东部平原“大邑商”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出以敬天法祖为信仰、以宗亲封建为体制、以敬德仁民为伦理、以礼乐教化为仪式核心的中原华夏文史大传统,奠定了“家、国、天下”的差序认同格局。生在春秋战国“古今之变”轴枢时的孔子,总结传承华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来两千年的中国留下了儒学根基。周朝经过前期的制度建设、春秋的文艺复兴和战国的现代化,最后由地近边陲执着农战的秦国实现了统一。中国农牧两大板块互动的主轴从此转成南北向,开启了近两千年内地编户齐民家国同构,南方山地土司封建、北方草原部落联盟,全国奉皇帝为“共主”,有时用“皇帝+天可汗”称号的天下体系格局。

公元后,第一个千年,汉承秦制独尊儒术挫败匈奴,扭转了春秋晚期以后农耕对畜牧板块的“700 年弱势”(时殷弘语),确立起中原对边疆的优势。司马迁根据天下大一统的新格局,设计出一套用“层累式构建”方法整理国故的“新软件”,把各地各民族古史传说中的英雄先祖在《史记》里重新统一排队,又让来自西北



上：西夏王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约30公里的贺兰山东麓（FOTOE）

下：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全景视觉）



方,跟汉武帝一样能打仗的轩辕黄帝坐上《本纪》首位,成为人文始祖。汉朝瓦解后,各民族政权相互攻伐兼并,最终由兼具胡汉身世的隋唐王室建立起集“中原皇帝和边疆天可汗”于一身的天下新体系。儒学在这一千年从中原传遍东亚影响西域。佛教和伊斯兰教从陆海两路传入中国落地生根。

第二个千年,北疆畜牧板块实力上升,不仅长期支配三北地区,而且两度建立天下王朝。儒学融汇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元素,演成新儒家理学。满族作为中国天下体系的盟主,找出了平衡治理农牧板块的有效办法,使长城变成文物。清朝推行满—汉、承德—北京、军机处和理藩院(及宗人府)—六部、佛教(及伊斯兰教)—儒学、边疆王公和亲土司纳贡—内地编户齐民科举纳税的双重复合体制。这种体制能兼容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一国N制并采用多种语文和宗教,从而能实现中国版图的空前统一,把周朝的理想模型做成了现实天下体系。

但天下体系圆满之日,就到了变法转型之时。康、雍、乾盛世刚过,西方列强即挟工商科技、基督教会和民族国家东来,用坚船利炮逼迫天下体系穿上民族国家条约体系的紧身衣。清朝成立管理外事的总理衙门并从沿海发起洋务运动,使东部沿海板块迅速崛起,奠定了当代中国东、中、西三部经济发展的差序格局。

甲午战败后,清廷对外割让台湾和辽东,对内扼杀戊戌变法,又煽动义和团愚鲁排外,从而不仅加深丧权辱国,而且酿成统治危机。失意汉人精英追踪太平天国组建革命会党,联合海外华侨打出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号,基于《史记》排名和反清复明话语,构建出鼓吹种族革命的“炎黄子孙”说。列强用《辛丑条约》强制总理衙门改成外务部,使洋务在体制上凌驾于少数民族事务之上。但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少数民族跟国家的边疆主权和国际形象仍然密不可分。

1911年,拖延改革的清廷激成辛亥革命,断送了君主立宪机遇。袁世凯用北洋实力斡旋清廷与革命党,

达成了建立民国但礼遇皇室的政治协议。《清帝逊位诏书》因而确认:“仍合满汉蒙回藏之固有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誓词确认:“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合中华民族为一人。”这两个重要文献确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华共和国体,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正统根基和权威定义。相比之下,明初到晚清会党的“中华”所指,仅为元明两朝的汉人族类,因而名不符实。辛亥革命前,它是失意汉人割据半个中国抱残守缺的苟且心志。今天,它是国际汉学和中国教育领域的知识盲区、偏见误区。

新中国按照1949年建国《共同纲领》,分别于1952年公布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制定国家《宪法》,并据此在民国“五族共和”基础上开展民族识别,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承认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权益,建成了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香港于1958年聚集精英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艰难时刻延续了新儒家文化香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还基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现了港澳回归。1992年,台湾海峡两岸达成共识确认一国两制的升级版。中华民族充实完善自身内涵的这些创举,给多民族统一的中国文化认同提供了如下启示:

第一,关于中华民族。中国很早就有东亚农耕尊儒学、内亚畜牧信宗教的一体两仪太极图式天下观和管理体系,是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文化根基。但“五族共和”即多民族统一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则是清朝解体民国初建之际,中华各民族“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现代新事务。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和中国边疆主权光复、少数民族权益伸张和民族大家庭平等关系确立,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形成和体现主体行动能力的标志。198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开放社会、一国两制、加入世贸组织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等新前景,引领考



上：青藏高原（苏发祥 摄） / 下：慕士塔格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陶县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交界处，海拔 7509 米（王建民 摄）

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界做出重大理论创新，把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升级成包括性更强、更能面向世界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话语，从而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新的话语范式，也为今后中国民族领域的体制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理据。

第二，关于中华民族文化。少数民族跟汉族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平等格局里的平等成员。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属于，但又都不能等同于中华民族文化整体。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真根源、真精神和真形态，只能在各民族共生共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中求取。它肯定会包括但不限于萨满信仰、象形表意和各种拼音文字文献、儒学、佛教、伊斯兰教。那种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把宋、明两朝等同于中国的看法既是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窄化、浅化、矮化和短化，也是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异化和冒犯。有人认为少数民族人少，影响力有限，冒犯一次关系不大，反正大家很快会“化”成一体。这是低估了民族文化认同的生命力和“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后果的严重性。合理的视角是把少数民族理解成中国村里的“姓氏”，“一个都不能少”才是硬道理。

第三，关于少数民族地位和中国民族关系。秦统一以来的历史表明，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影响力始终不低。过去两千年，少数民族不仅没有消亡同化的迹象，而且随着天下大一统的版本升级和进程提速，他们参与国家建设的能力更处于上升通道。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交往、团结进步、共建中华、共御外辱的证据浩如烟海，但没有少数民族整体同化于汉族的任何证据。历史上确有很多民族的名称和文化认同在变化互化，但硬要把这些变化互化说成“汉化”则是主流精英受国民教育“狼奶哺育”（袁伟时语）并做出的主观阐释，不是客观事实。例如“北魏汉化”就是鲜卑王室为便利统治和争取宫廷政争优势而利用中原文化的权宜选择。“汉化”后的北魏仅延国祚50年，无疑是少数民族参与中国历史文化构建的例证，且对隋唐文化产生过

重要影响。但说这是少数民族一心向往“汉化”则是汉人的一厢情愿。

本书总结历史上的中国民族结构：商周之前的各民族先民都是生息繁衍在东亚地面上的小族群。周秦大传统形成之后，汉族的先民因为地近中原，接近中央王朝而被大传统吸收同化较深较早，所以才在“五胡”入主中原时“被归堆儿”成一个名称不稳定的新族类。那种认为先秦就有“汉族”的说法很容易证伪：当时东亚确有大量人口“宅兹中国”。中国也确有一个“天下万邦共生共和”的文史传统，且有了象形表意文字和经典文献。这些文献也确实讲“华夷之辨”的春秋大义。但那只是周朝封建邦国统治者按照周礼宗法做文野之分而做出来的政治联盟。这些自诩为“文”的人作为中原华夏大传统，确是中国文史大传统的重要来源之一，甚至是其半壁江山，但它跟黎民百姓的根基认同还是两回事。当时没有“汉人”这个类别和称谓，也就没有“汉族”认同意识。今人称先秦古人为“汉”，是一厢情愿地给古人做民族识别，没有道理和可信性。很多人会抬出“汉字汉语”来做佐证，而不知这种语言文字在前两千年也不曾姓“汉”，而是华夏文史大传统的雅言载体。很多人还认为孔子是精英。其实他的祖籍宋国是周朝分给殷商后裔“继绝世”的封地。孔子一生崇拜三周（文王、公旦和礼法），但临终还是讲“而丘也，殷人也”，表达了作为周朝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勉强可算当时的“东夷后裔”。雍正皇帝对于“虞夏”和“姬周”两朝创始人的民族识别则是“西夷也”。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却是蒙古族后裔。正因为儒学的奠基人和最后的儒家来自农牧两大板块且都不是“汉族”，同时因为元清两朝都给孔子加封过“文宣王”和“大成至圣先师”的名号，所以儒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核心之一的资质较好。相比之下，汉人则有过刘邦羞辱儒生，洪秀全和“四人帮”都反孔批儒的事例。可见“汉人天然尊孔爱国论”也是强词夺理。

纵向看历史，中国汉朝之后的“五胡”等少数民族